

# 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

郑晓冬<sup>1</sup>,杨园争<sup>2</sup>,方向明<sup>1</sup>

(1.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社会活动参与是个人积极闲暇时间与社会资本的主要体现,对居民福利水平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构建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与参与频率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具体考察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农村老年人的朋友交往、休闲娱乐和为他人提供帮助等活动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最为明显。进一步探究影响的内在机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总体收入效应难以弥补替代效应是其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发挥负面作用的主要原因。因此,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本地经济,拓展当地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社区社会文化活动外部环境对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以及提高其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外出务工 农村 老年人 社会活动参与 福利

**【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2.008

**【收稿日期】**2018-09-17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9)02-008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留守老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17BRK018)

**【作者简介】**郑晓冬,男,浙江杭州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经济与农业经济;杨园争,女,山西忻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健康经济与农业经济;方向明(通讯作者),男,浙江义乌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健康经济与农业经济。

##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趋势明显,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仍然庞大。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8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0.6%,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超过50%<sup>①</sup>。农村劳动力迁移加之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造成了大量外出者的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一个普遍受到关注的群体便是农村留守老人。一方面,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依然较为有限,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居民晚年主要养老方式(张川川等,2014)<sup>[1]</sup>;另一方面,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得农村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由于子女的外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受到较大冲击,农业劳动与家务活动等事务更加繁重(杜鹏等,2004;左冬梅等,2011)<sup>[2][3]</sup>,农村老年人的福利状况令人担忧。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

<sup>①</su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幸福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课题。在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不少以往文献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研究了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福利的关系,以求提供乡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影响的经验证据以及应对措施。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个人福利不再仅仅以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或收入水平所衡量,福利的表征指标开始更加趋于多维,包括健康、主观福利、社会联系、时间利用等(Stiglitz et al., 2009)<sup>[4]</sup>。其中,时间利用与社会联系越来越被认为是个人福祉的重要体现(檀学文,2013)<sup>[5]</sup>,在有限的时间禀赋约束下,更大的个人时间分配自主权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福利水平(刘娜,2013)<sup>[6]</sup>。但是基于该视角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老年人福利的关系研究较为少见,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评估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努力正在于此。

劳动力流动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关注了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成员福利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关注的两类家庭成员分别为家中的儿童与老年人。就子女外出务工与老年人福利关系的研究而言,国外相关文献多是从老年人健康和主观福利等方面成年子女流动的影响。Antman(2010)研究了墨西哥成年子女移民美国对留在墨西哥的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发现家中子女移民美国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更低,受到心脏病、中风等健康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且经常感到沮丧、孤独和失落的概率更高<sup>[7]</sup>。Adhikari et al.(2011)发现泰国的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父母的躯体健康影响并不明显,但精神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sup>[8]</sup>。Oh(2014)针对菲律宾的研究表明,尽管子女外出务工后向家中汇款可提高家庭经济资源水平,但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仍显著下降<sup>[9]</sup>。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例如,Kuhn et al.(2011)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有利于父母的死亡率下降和自评健康水平的提高<sup>[10]</sup>。

由于户籍制度的特点,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讨论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福利间的关系。在老年人与健康方面,多项研究均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连玉君等,2015;舒玢玢等,2017)<sup>[11][12]</sup>,但也有研究得出子女外出务工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唐浩等,2014;王小龙等,2011)<sup>[13][14]</sup>。部分文献还从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衡量老年人福利水平,这些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后,老年人的经济条件虽有一定改善,但家务与劳动负担加重(李琴;2011)<sup>[15]</sup>,生活照料资源和精神慰藉明显减少(贺聪志等,2010)<sup>[16]</sup>。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相关研究,子女外出务工与老年人福利的关系都还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尤其是以健康和主观福利测量老年人福利水平的研究。因此,目前仍然需要更新的数据和视角进行研究验证。同时,现有研究仍至少存在两个不足,其一,在老年人福利指标选择上,少有研究着眼于时间分配利用和社会联系等指标测量老年人的客观福利。虽然Chang et al.(2011)针对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活动时间和家务活动时间增加<sup>[17]</sup>。但遗憾的是,该研究未考虑积极闲暇时间<sup>①</sup>与社会资本的体现: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代表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水平,是积极闲暇时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吴国宝等,2015)<sup>[18]</sup>,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将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感,并提高健康水平(郑晓冬等,2017)<sup>[19]</sup>;另一方面,社会活动参与也和个人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人们可通过社会活动参与拓展社会网络、增加信息渠道、实现信息共享、提供相互帮助与支持,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减轻收入差距等不确定风险的冲击,进而改善福利状况(温兴祥等,2017;周广肃等,2014)<sup>[20][21]</sup>。其二,缺少子女外出务工产生影响的机制检验。尽管郑晓冬等(2017)从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等方面对子女外出务工如

① 闲暇时间可分为积极闲暇时间和消极闲暇时间,其中,积极闲暇时间包括认知、体力、社会交往活动时间。

何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途径进行了有益探索<sup>[22]</sup>,但这些途径并不能完全解释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关系,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的影响仍需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关系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拓展现有研究的边界。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和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时间利用与社会联系的视角,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数据考察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从而为更全面地评估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有益补充。第二,根据理论分析,进一步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维度讨论与检验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机制,从而在更加具体解释本文的基本研究结果的同时,为促进农村老年人福利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二、理论框架

根据经典的时间分配理论(Becker, 1965)<sup>[23]</sup>,子女外出务工可通过两条途径作用于老年人的时间分配模式,分别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方面,外出子女提供给农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收入将促进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时间分配理论认为,货币收入与个人闲暇时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人们可以通过货币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来节约生产和劳动时间,从而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来提高个人福利水平。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子女外出务工在长期可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子女对留守父母的经济支持将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Antman, 2013)<sup>[24]</sup>,增加闲暇时间分配,从而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相关实证研究如白南生等(2007)的分析发现,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可缓解老年人的劳动负担,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福利<sup>[25]</sup>;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的生产与家务活动上劳动力损失将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于农业生产与家务活动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务工意味着农村老年人需要替代和补偿因此导致的劳动力损失,运用更多时间进行农业劳动以及料理家务(比如照料孙子女)。根据庞丽华等(2003)的调查统计,家中有外出务工子女的农村50岁及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是无外出子女人群劳动参与率的2倍<sup>[26]</sup>。李琴等(2009)则发现成年子女外流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sup>[27]</sup>。左冬梅等(2011)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曾帮助外出子女照料孙辈,其中42%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时间占孙辈童年成长过程的一半以上。由于个人的时间资源有限,参与更多农业生产和家务活动将不可避免地挤出闲暇时间,进而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

为更清晰地表述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机制,借鉴Xu(2017)的研究<sup>[28]</sup>,进行如下理论推导分析。假设一个农村家庭中只有两类成员,分别为老年人及其子女。家庭的全部生产和生活的相关活动由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完成,两者之间的活动可相互替代,意即当子女外出务工时,老年人可完成原本由本子女完成的活动。假设老年人与子女的时间禀赋均为T,由家庭生产活动时间(包括劳动与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构成,两者的分配比例分别为L和l,则有L+l=1。设个人的效用由消费和闲暇时间决定,且前者是后两者的单调增函数,个人效用函数表示为U(c,l),则家庭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_f(c_1, c_2, l_1, l_2) = \theta U_1(c_1, l_1) + (1 - \theta) U_2(c_2, l_2) \quad (1)$$

其中,c<sub>1</sub>,c<sub>2</sub>分别代表子女和老年人的消费率,l<sub>1</sub>,l<sub>2</sub>分别为子女和老年人的闲暇时间比例,而U<sub>1</sub>(c<sub>1</sub>,l<sub>1</sub>)和U<sub>2</sub>(c<sub>2</sub>,l<sub>2</sub>)分别是子女和老年人的效用函数,θ为家庭成员效用分配权重,取值范围为[0,1]。为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的消费率将与家庭生产活动回报率相等,即家庭预算约束为:

$$c_1 + c_2 = w_0(1 - l_1) + w_0(1 - l_2) \quad (2)$$

其中,  $w_0$  为非闲暇时间家庭生产活动的回报率。以上是子女未外出情况下的农村家庭效用函数与预算约束, 现在讨论子女外出务工后的情况。子女选择外出务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外出务工的长期回报率大于家庭生产活动的回报率, 二是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完成家庭生产活动有劳动力剩余, 设外出务工回报率为  $w_1$ , 恰好完成家庭生产活动所需的劳动时间比例为  $L_0$ , 则有:

$$w_1 > w_0 \quad (3)$$

$$L_0 < L_1 + L_2 \quad (4)$$

(4)式也可表达为  $L_0 < 2 - (l_1 + l_2)$ 。假设子女外出务工后的消费和时间分配保持不变, 则此时的家庭效用函数、家庭预算约束以及分别为:

$$\theta U_1(c_1, l_1) + (1 - \theta) U_2(c_2, l'_2) \quad (5)$$

$$c_1 + c_2 = w_1(1 - l_1) + w_0(1 - l'_2) \quad (6)$$

其中,  $l'_2$  为子女外出后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分配比例。设  $M$  表示农村老年人收到的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当外出子女提供给留守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时, 则有:

$$M = w_1(1 - l_1) - c_1 > 0 \quad (7)$$

将(7)式带入(6)式的预算约束中, 可以得到:

$$w_0(1 - l'_2) < c_2 = w_0(1 - l_2) \quad (8)$$

因此有  $l'_2 > l_2$ 。该式的含义是: 子女外出务工后, 提供给农村留守父母的经济支持有利于增加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时间, 进而有助于促进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 此即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 由于家庭生产活动原本由家庭成员协作完成, 因而原本单个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将难以完成全部家庭生产活动, 即  $\max(L_1, L_2) < L_0$ , 转换可得  $\max(1 - l_1, 1 - l_2) < L_0$ , 因此, 对于老年人而言, 有  $1 - l_2 < L_0$ 。该式的含义是: 子女外出后, 若要保持外出前的家庭总体效用水平, 家庭生产活动将由老年人全部承担, 故老年人将增加家庭生产活动时间, 减少闲暇时间, 降低社会活动参与水平, 此即子女外出务工的替代效应。由于子女外出务工产生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作用方向相反, 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程度是增是减并不确定, 这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者的大小, 具体结果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 CHARLS 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 以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全国大型家户调查。该调查的问卷设计参考了多个发达国家的经验, 采用多阶段 PPS 抽样, 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 150 个县的 450 个(社区)村。CHARLS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含本文关注的子女外出务工状况)、家庭成员交往、家庭收入支出、工作、健康、生活方式(含本文关注的被访者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养老等方面信息。根据本文研究目标, 为考察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 选取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观测值, 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5725 个。

#### (二) 变量选取与描述

1. 社会活动参与。CHARLS 的“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模块调查了被访者 10 项“过去一个月”的闲暇活动情况, 这 10 项活动分别可简称为: 朋友交往、休闲娱乐、提供帮助、运动健身、社团活动、志愿者

表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标准化指数	-0.129	0.809	-0.766	5.18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标准化指数	-0.196	0.767	-0.724	4.86
关键自变量	子女外出务工	有否子女外出务工;1=有,0=无	0.467	0.499	0	1
	外出务工子女数	外出务工子女数(人)	0.832	1.143	0	7
控制变量	男性	性别;1=男性,0=女性	0.488	0.500	0	1
	年龄	年龄(岁)	67.909	6.674	60	103
	已婚	婚姻状况;1=已婚,0=其他	0.802	0.398	0	1
	小学	受教育程度;1=小学,0=其他	0.250	0.433	0	1
	初中	受教育程度;1=初中,0=其他	0.091	0.288	0	1
	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1=高中及以上,0=其他	0.019	0.137	0	1
	个人工资收入	去年个人工资收入(元)的自然对数	3.888	2.831	0	11.50
	家庭规模	目前家庭人口数(人)的自然对数	1.326	0.415	0	2.83
	医疗保险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1=是,0=否	0.870	0.336	0	1
	养老保险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1=是,0=否	0.958	0.200	0	1
	慢性病	有否慢性病;1=有,0=无	0.721	0.449	0	1
	残疾	有否残疾;1=有,0=无	0.162	0.368	0	1

善、学习教育、炒股、上网。参考薛新东等(2012)的界定<sup>[29]</sup>,本文不将“炒股”和“上网”两项社会参与性质较弱的活动纳入分析范围,最终采用8项社会活动进行研究<sup>①</sup>。CHARLS调查除了询问被访者是否参与每项活动,还进一步调查了参与活动者的参与频率,分别为“不经常”、“差不多每周”和“差不多每天”。依据这一特点,本文设定两类社会活动参与指标,分别命名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和“社会活动参与频率”。针对第一类指标,按照被访者参与社会活动的种类数进行计分,如被访者未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则计0分,如参与全部8项社会活动,则计8分。针对第二类指标,将未参与单项社会活动计0分,同时按照社会活动参与频率的选项,将“不经常”、“差不多每周”和“差不多每天”分别赋值为1~3分,8项社会活动汇总后的取值范围为0~24分。为便于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将两类社会活动参与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SA_i = \frac{(S_i - \bar{S})}{\sqrt{\text{var}(S)}} \quad (9)$$

其中,  $SA_i$  指第  $i$  个样本的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或频率)的标准化指数,  $S_i$  指第  $i$  个样本的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或频率)得分,由8项社会活动汇总而得,  $\bar{S}$  为总体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或频率)的均值,  $\sqrt{\text{var}(S)}$  表示总体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或频率)的标准差。

2. 子女外出务工。参考连玉君等(2015)和王小龙等(2011)的研究,本文设定了两类子女外出务工指标。第一类是有否子女外出务工,分别赋值1和0。第二类是外出务工子女数。具体子女外出务

<sup>①</sup> 这8项社会活动分别是:(1)“串门、跟朋友交往”; (2)“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 (3)“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 (4)“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练气功等”; (5)“参加社团组织活动”; (6)“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 (7)“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 (8)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工情况根据子女信息中的工作状况以及现居住地进行识别,如子女居住地为本县(市)以外并已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则认定为外出务工子女。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王莉莉,2011)<sup>[30]</sup>,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在模型中加入了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相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与家庭特征、社会保障、初始健康状况等。其中,个人与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工资收入和家庭规模等,社会保障情况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初始健康因素包括慢性病与残疾。本文所用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标准化处理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与频率,两者均为连续变量,因此设定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T_i = \beta_0 + \beta_1 LM_i + \beta_2 X_i + \beta_3 P_i + \varepsilon_i \quad (10)$$

其中 $T_i$ 表示第*i*个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 $LM_i$ 表示第*i*个老年人的子女外出务工情况, $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P$ 为用以控制区域固定效应的一系列省份虚拟变量, $\varepsilon$ 为模型的扰动项。变量 $LM_i$ 的估计系数 $\beta_1$ 测量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考虑到个体所处的社区(村)的共同特征,在进行回归估计时按照社区(村)编码(ID)计算聚类标准误,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此外,下文还将讨论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

表2报告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影响的多变量线性回归估计结果。对于社会活动参与种类与参与频率两项反映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指标,均拟合了4个模型,这4个模型均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区域差异,各个模型的不同点在于不同的子女外出指标以及是否纳入个人与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第(1)列~第(4)列为以社会活动参与种类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是否考虑个人与家庭层面的因素,子女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子女数指标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有否子女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大于外出务工子女数的边际作用。这说明,子女外出务工将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丰富度,且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否子女外出务工上。在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子女外出务工使得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数平均下降7.1%,同时,家中每增加一个外出务工子女,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的丰富度将平均降低2.9%。第(5)列~第(8)列为以社会活动参与频率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也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频率,在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中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频率平均降低8%,外出子女每增加一个,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频率将平均下降3.4%。以上结果证实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负向影响在各个模型中都很稳定,此外,比较边际效应可知,相比而言,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频率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更大。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年龄的增加、已婚、残疾将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工资收入的提高以及有医疗保险则对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以往文献所得结论一致(王莉莉,2011)。

### (二)子女外出务工与不同种类的社会活动参与

上文的结果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将导致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与参与频率都有所下降,那

表2 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1)	(2)	(3)	(4)	(5)	(6)	(7)	(8)
子女外出务工	-0.080*** (0.024)	—	-0.071*** (0.024)	—	-0.095*** (0.023)	—	-0.080*** (0.022)	—
外出务工子女数	—	-0.033*** (0.010)	—	-0.029*** (0.010)	—	-0.041*** (0.009)	—	-0.034***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155*** (0.056)	-0.167*** (0.056)	-0.314*** (0.080)	-0.317*** (0.081)	-0.191*** (0.055)	-0.203*** (0.054)	-0.398*** (0.074)	-0.402*** (0.074)
观测值数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R <sup>2</sup>	0.024	0.024	0.053	0.053	0.024	0.024	0.050	0.050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聚类标准为社区ID。下同。

么具体有哪些社会活动受到了明显的负向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回答这一问题。表3汇报了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各项社会活动参与的回归结果, 本文将8项社会活动分别简称为: “交友”、“娱乐”、“帮助”、“运动”、“社团”、“志愿”、“照顾”、“教育”。其中, Panel A中的因变量为是否参与某种社会活动的虚拟变量, 关键自变量为有否子女外出务工, 采用Probit模型估计, 并将估计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结果显示,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的朋友交往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以及志愿服务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尤其是对前三者的影响较为明显(各自下降2%左右), 而对其他类

表3 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各项社会活动参与的回归结果

变量	(1)交友	(2)娱乐	(3)帮助	(4)运动	(5)社团	(6)志愿	(7)照顾	(8)教育
Panel A: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子女外出务工	-0.021* (0.012)	-0.020** (0.009)	-0.020*** (0.008)	-0.000 (0.005)	-0.003 (0.003)	-0.004** (0.002)	-0.002 (0.003)	-0.001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Pseudo R <sup>2</sup>	0.045	0.060	0.031	0.037	0.010	0.010	0.021	0.018
Panel B: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子女外出务工	-0.057** (0.027)	-0.053** (0.023)	-0.053** (0.022)	-0.006 (0.009)	-0.009 (0.006)	-0.011** (0.005)	-0.006 (0.008)	-0.003*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5725
R <sup>2</sup>	0.031	0.059	0.029	0.027	0.010	0.011	0.022	0.020

注: 若表中因变量为虚拟变则采用Probit模型估计, 若表中因变量为连续变量且存在大量零值, 则采用Tobit模型估计。为便于比较, 表中的估计系数为经转化后的边际效应。下同。

别活动的作用并不显著。Panel B 中的因变量分别是各项社会活动的参与频率,关键自变量仍为有否子女外出务工。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影响显著的社会活动类别为:朋友交往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志愿慈善活动以及学习教育活动。同样的,子女外出务工对前者的边际影响更加明显。

根据对表3回归结果的分析可得,子女外出务工主要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为:“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和“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以上几项活动需要老年人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才可参与,那么子女外出务工为何减少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接下来本文将对子女外出务工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

### (三)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收入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子女外出务工通过两个方面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一是产生正面作用的收入效应,二是发挥负面作用的替代效应。上文得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总体有负面影响,那么理论上应该是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导致。因此,本部分就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检验与讨论。首先考虑与检验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我们采用两种方式对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进行检验。第一种是直接考察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我们以不与老年人住在一起的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子女经济支持变量有两类,一是过去一年子女有否提供父母经济支持,二是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金额<sup>①</sup>,根据上述两个因变量的特点,分别采用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4中第(1)列~第(4)列报告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的子女经济支持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比无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家中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平均提高 5.2%,家中有子女外出的老人收到的子女经济支持金额显著高 24.4%。此外,每增加一个外出务工子女数,老人有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和经济支持水平分别平均提高 2.1% 和 13.2%,这证实了子女外出务工存在收入效应。

第二种考察收入效应的方式是比较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在不同子女经济支持水平下的差异,我们将全样本分为无子女经济支持组和有子女经济支持组,如果子女外出务工对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负面影响更小或者产生了正面影响,则说明存在收入效应。表4的第(5)列~第(8)列汇报了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影响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无子女经济支持组中,子女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子女数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数,而对于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则并没有明显影响。我们也以社会活动参与频率作为因变量进行检验,发现结果类似,这再次证实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同时也说明了,在有子女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子女外出务工并不明显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此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互抵消。而前文得到的子女外出务工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女外出务工并没有提供给老年人经济支持,从而使得起负面作用的替代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子女外出务工未能增加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对于外出务工不久的青壮年农村居民,从离开农村到在城市中寻找工作这段时间内,务工人员并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与此同时这类群体还需要不少开支,比如进城的路费和寻找工作初期的生活费(连玉君,2015),因此外出务工初期的子女难以提供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老年人甚至反过来需要给子女进行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二,在子女找到工作后,由于在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成本更高,即便子女外出务工获取收入,但在工作

<sup>①</sup> 为更加便于回归结果的解释,经济支持金额变量为老年人过去一年收到不居住在一起子女经济支持金额的自然对数。

表4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收入效应

变量	有否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金额	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1)	(2)		(5)	(6)	(7)	(8)
子女外出务工	0.052*** (0.010)	—	0.244** (0.113)	—	0.034 (0.057)	—	-0.105*** (0.026)
外出务工子女数	—	0.021*** (0.007)	—	0.132*** (0.049)	—	-0.004 (0.021)	-0.039***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4702	4702	4702	4702	4702	1023	1023
R <sup>2</sup> /Pseudo R <sup>2</sup>	0.055	0.054	0.026	0.027	0.075	0.073	0.059
							0.058

后的短期内仍不能提高对父母的经济赡养水平。虽然部分农村劳动力外流并未增加对老年父母的转移支付,但这并不违背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子女外出长期回报率大于家庭生产活动回报率的假设,长期来看,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很有可能将相互抵消。

#### (四)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替代效应

在上节收入效应的讨论中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后若未能提供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则子女外出务工将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被解释为替代效应。那么子女外出务工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本节主要通过考察子女外出务工与老年人非闲暇活动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与检验。根据理论分析,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闲暇时间的减少,而这些闲暇时间主要可能被用于增加劳动供给以及家务料理等活动时间。表5给出了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与照料孙子女的关系。其中第(1)列~第(4)列的因变量为老年人过去一周有否参加劳动以及有否进行自家农业生产活动,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并将回归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人参加劳动的概率,尤其是进行自家农业劳动,两者分别提高5.6%和6.7%,且外出务工子女数越多,农村老年人的劳动负担越重。原因在于,子女外出后,原本由子女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由老年人承担,这与本文关于替代效应的解释相符。

表5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替代效应

变量	参加劳动		自家农业生产活动		有否照料孙子女		照料孙子女时间	
	(1)	(2)	(3)	(4)	(5)	(6)	(7)	(8)
子女外出务工	0.056*** (0.012)	—	0.067*** (0.013)	—	0.024* (0.013)	—	1.081* (0.630)	—
外出务工子女数	—	0.015*** (0.006)	—	0.018*** (0.006)	—	0.011** (0.006)	—	0.478* (0.2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5724	5724	5722	5722	5715	5715	5720	5720
Pseudo R <sup>2</sup>	0.040	0.039	0.038	0.036	0.103	0.103	0.032	0.031

表5中第(5)列~第(8)列的因变量分别是有否照料孙子女以及照料孙子女时间(周数),分别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估计。观察回归结果可知,家中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概率将平均增加2.4%,照料孙子女的时间将平均增加1.08周,同样的外出子女数越多,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也将更重。这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存在导致了农村儿童在城市难以获得相应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大量老年人留守农村的同时,也产生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而这些留守儿童的抚养与生活照料多是由其祖父母负责。

### (五)内生性问题

虽然本文在模型设定中加入了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然而,模型估计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般的内生性问题有两个来源,一是联立性问题,即子女外出务工可能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比如社会活动参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健康状态越好,从而更不需要子女外出务工获取收入来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又或者参与较多社会活动的老年人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可能获得更多的城市就业信息,进而有利于子女外出务工。内生性问题的第二个来源为遗漏变量问题,即模型未考虑既与子女外出务工相关,又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关联的因素,比如老年人的社交能力与性格特征与其参与社会活动行为相关,同时也将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的决策。因此,本节采用关键自变量的滞后项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估计两种方法对本文的基本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首先,为检验联立性问题,我们采用滞后一期,即2011年CHARLS调查的子女外出务工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来验证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关系,结果如表6的第(1)列~第(4)列所示。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子女数变量均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和参与频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基准模型中的联立性问题并不明显。

其次,参考以往研究,我们采用滞后一期社区劳动力迁移率,即2011年CHARLS调查社区(村)数据中外出务工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作为当期子女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从而检验两种内生性来源是否明显影响本文基本结论。运用滞后期的社区劳动力迁移率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首先,社区的劳动力迁移率与家庭劳动力外出决策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主要体现在移民网络在迁移成本上的缩减和迁移积极性上的带动作用上(Winters, 1999)<sup>[31]</sup>。外出务工群

表6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滞后一期子女外出务工变量				IV: 滞后一期社区劳动力迁移率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社会活动参与种类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1)	(2)	(3)	(4)	(5)	(6)	(7)	(8)
子女外出务工	-0.026 <sup>*</sup> (0.014)	—	-0.031 <sup>*</sup> (0.017)	—	-0.111 <sup>**</sup> (0.047)	—	-0.118 <sup>**</sup> (0.050)	—
外出务工子女数	—	-0.009 <sup>*</sup> (0.005)	—	-0.014 <sup>**</sup> (0.006)	—	-0.049 <sup>**</sup> (0.021)	—	-0.053 <sup>**</sup> (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5723	5723	5723	5723	5174	5174	5174	5174
R <sup>2</sup> / Pseudo R <sup>2</sup>	0.685	0.686	0.539	0.541	0.053	0.052	0.055	0.054

注:第(5)~第(8)列为2SLS回归估计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结果中,各个模型中滞后一期社区劳动力迁移率与当期子女外出务工显著相关,且模型F估计量均超过2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限于篇幅,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不再汇报。

体作为一种移民社会网络,可以为打算外出的社区成员提供就业信息及外出目的地的临时住所,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同时,对未外出的劳动力而言,社区外出群体的扩大将提高农村居民对外出的收益预期,从而使得外出务工的决策更具吸引力。所以理论上社区劳动迁移率与家庭劳动力转移情况相关,同时,社区劳动力迁移率,尤其是历史劳动力迁移状况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安排并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表6的第(5)列~第(8)列汇报了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子女数同样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和参与频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且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的差异并不大。这再次验证了本文所得结果稳健可靠。

##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3),本文通过个人福利的时间利用与社会联系维度切入,实证检验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种类和参与频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社会活动参与频率的影响更大,采用滞后项估计以及工具变量法估计发现结果依然稳健;第二,通过考察具体每项社会活动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和“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等三项社会活动的负面作用较为明显,而这三项活动正是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最大的社会活动形式(温兴祥等,2017);第三,通过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的探究的结果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后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总体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也因子女的外出而提高了自家农业生产活动的参与率以及增加了照料孙子女的时间。总体而言,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难以弥补替代效应是子女外出务工发挥负面作用的主要原因。

因此,从社会活动参与视角来看,本文认为子女外出务工将降低农村老年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总体不利于老年人福利。然而,我们仍需对本文的结论保持谨慎,这是因为:其一,表征闲暇时间与社会资本的社会活动参与仅是福利水平的一个维度,因而本文仅揭示了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老年人福利关系的一个侧面,在看待该问题时不应以偏概全。其二,虽然更多的积极闲暇时间意味着更高的福利水平,但在中国情境下,由于不同老年人的福利维度偏好可能有所差异,以上论断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例如,虽然子女外出务工导致了农村老年人闲暇时间减少、社会活动参与度下降,但部分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可能并不一定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可能已将孙辈照料、家务和农业劳动内化为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因而在子女外出务工后,那些原先有较多闲暇时间的老人为自己能对家庭做出的贡献而在精神上感到愉悦,同时在照料孙辈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含饴弄孙”的福利改进。因此,关于子女外出务工的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还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入讨论和验证。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完善现阶段仍较为薄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经济状况不佳的留守家庭的经济支持,给予外出劳动力和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更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使外出子女在经济上更有能力抚养子女及的子女以及赡养农村的父母,从而减轻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压力,保障其基本生活。第二,鼓励建立如老年协会等的社区社会活动组织和团体,加强社会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的建设,营造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良好氛围与环境。第三,加强本地特色经济建设,增加当地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提高本地就业市场的吸引力,从而缩短子女外出距离,减轻农村老年人的劳动负担,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 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 102-115.
- [2]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等.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6): 44-52.
- [3] 左冬梅,李树苗.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2): 93-100.
- [4] Stiglitz J E, Sen A, Fitoussi J.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R]. Paris: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10.
- [5] 檀学文.时间利用对个人福祉的影响初探——基于中国农民福祉抽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10):76-90.
- [6] 刘娜.非劳动收入的时间福利——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J].世界经济文汇,2013(4): 98-120.
- [7] Antman F M.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in Mexico[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2): 205-208.
- [8] Adhikari R, Jampaklay A, Chamratrithirong A.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J]. BMC Public Health, 2011(1): 143.
- [9] Oh Y A.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ies of Migrants in the Philippines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4(3): 249-271.
- [10] Kuhn R, Everett B, Silvey R.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Elderly Kin's Health: A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J]. Demography. 2011(1): 183-209.
- [11] 连玉君,黎文素,黄必红.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5(1): 185-202.
- [12] 舒玢玢,同钰莹.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J].人口研究,2017(2): 42-56.
- [13] 唐浩,施光荣.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12): 95-101.
- [14] 王小龙,兰永生.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J].南开经济研究,2011(4): 21-31.
- [15] 李琴,孙良媛.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J].学术研究, 2011(4): 85-89.
- [16] 贺聰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 46-53.
- [17] Chang H, Dong X Y, Macphail F. 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1(12): 2199-2210.
- [18] 吴国宝,檀学文.用多少时间为己而活?——作为福祉的农民个人生活时间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9): 57-68.
- [19] 郑晓冬,方向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2011数据的考察 [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6-23.
- [20] 温兴祥,文凤,叶林祥.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130-144.
- [21] 周广肃,樊纲,申广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7): 12-21.
- [22] 郑晓冬,方向明.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基于路径分析方法的检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8): 188-198.
- [23]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 Economic Journal, 1965(299): 493-517.
- [24] Antman F M.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amily Left Behind[J].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Migration , 2013: 293.

- [25] 白南生,李靖,陈晨.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 46-52.
- [26] 庞丽华,Rozelle Scott,De Brauw Alan.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3(2): 721-730.
- [27] 李琴,宋月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09(5): 52-60.
- [28] Xu H. The Time Use Pattern and Labour Supply of the Left Behind Spouse a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46): S77-S101.
- [29] 薛新东,刘国恩.社会资本决定健康状况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J].财贸经济,2012(8): 113-121.
- [30] 王莉莉.中国老年人闲暇活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2011(3): 35-42.
- [31] Winters P, Janvry A D, Sadoulet E. Family and Community Networks in Mexico-U.S. Migration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9(1): 159-184.

### Child Migration and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ZHENG Xiao-dong<sup>1</sup>, YANG Yuan-zheng<sup>2</sup>, FANG Xiang-ming<sup>1</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The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is a major manifest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active leisure time and social capital, and is crucial for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well-be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e Study in 2013 (CHARLS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ld mi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types and frequency of social activity. Specifically, the impact on activities of friend interac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and helping others are more obvious. The results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show that adult child migration has both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It is because the income effect is difficult to make up for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that adult child migration exert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continuing to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local economy, expanding the local employment market,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social and cultural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on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Adult Child Migration; Rural Areas; The Elderly; Well-being;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 特别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